

## **Constructing a Space of Reclusion: The Writing about Nanyang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Du Yunxie's *You Are the First I Loved***

**ZHANG Bingyu**

Ph.D Candidate,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WONG Lih Lih**

Assistant Professor,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 **Abstract**

Du Yunxie is a renowned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poet, and his poetry and prose about Nanyang (Southeast Asia) are often seen as reflecting a tension between “Chineseness” and “Nanyangness”. In his works, the motif of “Nanyang” is frequently regarded as a vehicle for expressing Chinese identity. However, this paper does not fully agree with it.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Du Yunxie's poetry collection *You Are the First I Loved*, published in 1993 after his return to Southeast Asia, as the primary text for analysis. The collection will be examined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literary works by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how Du's poetry represents Nanyang,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invoking “Nanyang” in his work, and how these motives differ from those in his earlier works. The study also aims to uncover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literary shift and the concept of "Chinese hiddenness" in culture.

### **Keywords**

Du Yunxi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Writer, Cold War, Literary Writing about Nanyang, Culture of Reclusion

# 隐逸情怀的异域投射

##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中的南洋书写其意义析探

章炳煜\* 黄丽丽\*\*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学院

### 内容摘要

杜运燮是著名归侨诗人，其有关南洋的诗文往往被认为是呈现出“中国性”与“南洋性”的拉扯。同时，杜氏诗文中“南洋”的运用往往被当作中国性的载体。然而，对此，笔者却并不认同。因之，本文将以杜运燮重返南洋场域后于1993年出版的诗文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作为主要研究文本，并将其放置入“文革”后归侨作家们文学创作的脉络中，细致探索这部诗文集如何书写南洋、“南洋”在诗文中被选择调用的目的与意义以及其与此前作品中调用“南洋”之动机的流变关系，同时试图挖掘这种流变与“隐逸”文化之间的关系。

### 关键词

杜运燮；归侨作家；冷战；南洋书写；隐逸文化

---

\* 章炳煜，拉曼大学博士候选人，电邮地址：zhangbingyu@lutar.my。

\*\* 黄丽丽，拉曼大学助理教授，电邮地址：wongll@utar.edu.my。

## 一、前言

杜运燮（1918-2002），祖籍福建古田，191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实兆远，中国著名归侨诗人、“九叶诗派”成员，笔名主要有：吴进、吴达翰、杜松。初中毕业后，杜运燮离开了马来（西）亚，第一次踏上祖国（中国）的土地，并在福州三一中学完成了他的高中阶段。随后于1938年参加统考，考入浙江大学农业学系。但是因为战争的原因，浙江大学迁移至贵州，杜氏遂就近在厦门大学生物系借读一年，旋即转入西南联大修读外国语言文学科目。1940年，杜运燮开始集中在香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大学毕业后，杜运燮先后在重庆的《大公报》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编辑，随后又辗转到新加坡的南洋女子中学和华侨中学担任教师，彼时他创作的大量诗文作品主要发表在上海的《中国新诗》。二战后，英殖民政府重回马来亚，因为惧怕共产主义左翼思想的侵入和民族主义运动对殖民政府的反叛，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此背景下，大量海外的华人华侨由于各种原因被驱逐出境，杜运燮便因支持华侨学生的左翼行动而成为了其中的一员。1950年，在被新加坡英殖民当局驱逐后，杜运燮短暂任职于香港的《大公报》与《新晚报》。1951年，赴新华通讯社的国际部（位于北京）工作。1970年，杜的“南洋经历”令他被下放到永济的“五七”干校（山西）进行劳改，至1973年始获平反。1979年再次回到北京，重新任职于新华社国际部，一直到其退休。1992年，他在阔别南洋40多年后再次重返南洋场域，并于次年根据自己此次重返南洋的所思所感出版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晚年的杜运燮大都忙于帮助好友穆旦整理遗稿以及将自己发表过的诗文加以整理汇编，新作的出品也相对放缓，而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因为是在马来西亚出版，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中国研究场或许因为诗集并非出版于中国而有接受上的延迟；马来西亚研究场则受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趋势的影响，对类似杜运燮这种北归的作家长期未有重视或者说排除在研究的场域之外）。按此，本文将先对以往有关杜运燮的研究加以综述，分析杜氏相关研究的趋势，然后进一步落到前人对其南洋书写的研究，特别是有关于《你是我爱的第一个》的，考察它们的切入点、见解，以此展开本文的后续探述。

综览关于杜运燮的研究论著可以发现,学者大多来自中国(特别是大陆地区,如:朱崇科、游友基、李詮林、余峥等)、马来西亚(特别是马来西亚华人学者,如:许文荣、李树枝;还包括一些在台马华学者,如:鍾怡雯、陈大为),并且论著多是中文写就,外文的基本没有(有的话也只是略略一提,没有专篇论述的)。或许正如杜克大学刘康教授所言:“汉学这个小圈子在美国很小很小”<sup>1</sup>,汉学研究在中国以外场域本来就很有限,早期比较密集地聚焦在社会科学领域,对文学的研究相对缺乏,更何况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逐渐起步,近几年开始被突出关注,逐渐成为显学,且如有关杜运燮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研究者主要是华人学者。

总的来说,就目前笔者所搜集到的材料来看,早期研究大体是将杜运燮简单地收编入中国文学当中,忽略了他的跨域属性与归侨身份,并且研究也主要是凸显他作为“九叶诗派”的成员,多从诗歌作品的技法入手,特别会联系到杜在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习经历。间中,部分论著会涉及介绍杜运燮的两地经历,但是仍然难脱“现代派诗人”“九叶派”“西南联大”等几个关键词的统摄,最终这种介绍只能流于浅层,未能更加深入。不过,此间也存有例外,譬如:王永志 1992 年发表的〈中国诗歌星空的独特星座——试论归侨诗人群体〉注意到了杜运燮的归侨身份,但是因为宏观研究,所以涉及到的内容仍然比较泛泛。

2010 年左右,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被再度提及,有关杜运燮的双重跨域身份也逐渐为学界所重视。相关论著有:李詮林的〈“九叶诗人”杜运燮的华文书写谈隅〉(2012 年)<sup>2</sup>,开始意识到杜的“南洋与中国的两地经验”,并认为杜的这一特性以及他的朦胧诗长期为学界忽视,因此藉此文来吁请研究者的注意,所以文内记述了许多杜的生平经历,但是依然没有很好地结合阐述。2022 年李詮林再次发表新论〈杜运燮归侨诗歌异国因素和身份感知辨析〉,文中相比前一篇而言更进一步,不再拘囿于简单跨域经验的描述,而是结合论述,从“侨易学”的角度入手,以杜运燮的文学作品入手,探索其作为归侨作家从海外侨居地(马

<sup>1</sup> 刘康,《后殖民理论与“华语语系文学”——评吴娱玉〈西方理论中的中国〉》,《中国图书评论》2018 年第 10 期,第 96 页。

<sup>2</sup> 李詮林,《艺术身份的聚结与文化身份的流散——“九叶诗人”杜运燮的华文书写谈隅》,《华文文学》2012 年第 06 期,第 56-60 页。

来亚)归返中国所产生的身份认同上的变化在文学中的反映。<sup>3</sup>许文荣〈搭建中国与南洋的鹊桥：论杜运燮诗文创作中的双重经验〉(2014年)，以杜氏中国—南洋两地的双重经历与跨域经验来解构他的诗文创作，肯定了其“双重经验”所带来的文学上的“双重视角”，并结合其诗文分析杜的中国情怀与南洋华人情怀。<sup>4</sup>次年，李树枝从“空间诗学”的角度入手，联系杜运燮往返马来半岛与中国的流动经验，同样对杜的诗作展开了研究，写就〈论杜运燮诗作之马来半岛空间书写与蕴含〉，揭示了杜氏诗文作品中的两个深层蕴含——政治性蕴含与亲性蕴含。<sup>5</sup>除此，其它的论著还有，锺怡雯〈杜运燮与吴进——一个跨国文学史的案例〉(2012年)与〈跨越国境：文学史版图上的杜运燮和吴进〉(2020年)也注意到了杜运燮的“双重经验与身份”。

承上所述，有关杜运燮的研究并不少，但是注意并有意从其跨域经验展开研究的并不算太多，且也是近十年方才备受重视。然，综览这些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多数研究都是停留在杜运燮“归返”这一个维度，而关于其改革开放后重返出生地的文学书写(《你是我爱的第一个》)却鲜少论及，或许恰如许文荣所言“过去对杜运燮诗的研究不少，但是对他的这部在马来西亚霹雳州(杜运燮的出生地)创作与出版的诗集的研究却是前所未见。主要可能是它的流通量不大，大陆学者对这部诗集与其所写的事物较不熟悉。”<sup>6</sup>由此，许文荣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研究尚存空缺，发表了以《你是我爱的第一个》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力作，文中探访了杜氏诗文背后“情感”与“形式”间的动态关系，并将“情感”细致归纳为“三对六种”(个体情感与群体情感、直接情感与间接情感、表层情感与深层情感)以及逐一分析它们对应的表达形式。<sup>7</sup>

<sup>3</sup> 李詮林，《“侨易文学”、马来西亚留中文学与西南联大的欧美风——杜运燮归侨诗歌异国因素和身份感知辨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2年第03期，第14-21页。

<sup>4</sup> 许文荣，《搭建中国与南洋的鹊桥——论杜运燮诗文创作中的双重经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06期，第73-79页。

<sup>5</sup> 李树枝，《“来回”马来半岛与中国大陆——论杜运燮诗作之马来半岛空间书写与蕴含》，《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02期，第70-74页。文中需要特别阐明的是，论者所发现的杜运燮诗作中对马来半岛之空间书写的两种互为反命题的蕴含分别指向：其一，政治性蕴含，强调杜运燮受英国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影响，在书写马来半岛空间时，朝向包裹其的社会历史空间事件的维度(大历史)展开；其二，亲性蕴含则一反政治性蕴含，侧重于马来半岛作为其第二故乡的故土空间里面或之间的物质想象和物质感受层面，往往比之“政治性蕴含”具有温暖、幸福、安全感的面向。

<sup>6</sup> 许文荣，《杜运燮诗歌中“情感”与“形式”的动态关系——以南洋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为个案分析》，《华文文学》2011年第06期(总第107期)，第36页。

<sup>7</sup> 许文荣，《杜运燮诗歌中“情感”与“形式”的动态关系》，第35-41页。

迹来,朱崇科与张灵馨合作的〈论杜运燮的“南洋”情结及其再现〉(2023年)从诗人杜运燮的南洋情结入手,探索“南洋”情结在杜一生的创作中的变动。论者通过对杜运燮诗文的详细剖析,分出了其“南洋情结”的三个阶段:一、在南洋,信奉“此时此地”的在地书写;二、再南洋:短暂回望南洋带来的情感结构变化,但同时又是再见“南洋”;三、归根结底,对于中国作家杜运燮来说,南洋更多是一种载体和精神书写资源。<sup>8</sup>其中,第二个阶段“再南洋”就是对杜运燮20世纪九十年代重返南洋时文学书写的考察,而《你是我爱的第一个》便是研究这一创作阶段的重点。论者以为,杜在“再南洋”时期经历了从“拥抱南洋”到“再见南洋”(表示一种与南洋诀别的情态)的转变。但笔者却不这么认为,特别是论者所说的“再见南洋”。依循全文逻辑,从“在南洋”到“再(见)南洋”再到“载体南洋”,一如文末所提点的那样,“他(杜运燮)退休后重返新马可以一时之间真情流露,但也无法改变南洋日益成为思想表述载体和部分资源的现实追求与身份宿命——华侨,毕竟还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人。”<sup>9</sup>职此之由,在论者看来,“南洋”之于杜运燮到底是沦为了空洞的能指,对它(南洋)的情感流露只能是有条件的、偶然的触发。这显然忽视了被言说为“第二故乡”的“南洋”在杜运燮“乡愁”情感中的作用力及其本身的主体性,而全然地让杜氏的南洋乡愁“服膺”于政治中国人认同的规训。因此,本研究旨在重新考释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文本间隐微透露出的重返南洋、面对故土时心态的复杂褶曲面,特别是在经历过前期的下放劳改等一系列创伤后,杜氏如何在一种对“南洋故乡”的自然而然的乡愁情绪中将隐逸情怀于文本间投射向南洋,以此让文学南洋成为其暂时逃避俗世纷扰、抚慰内心伤痕的诗意空间。

## 二、冷战洪流中的归侨作家

归侨,即归国华侨,所以华侨可以视作是归侨的前身,因此有论者“自从有

<sup>8</sup> 朱崇科、张灵馨,《论杜运燮的“南洋”情结及其再现》,《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1期(总第173期),第19页。

<sup>9</sup> 朱崇科、张灵馨,《论杜运燮的“南洋”情结及其再现》,页28。

了居留国外的华侨，也就相应地会有部分回流国内的归侨”<sup>10</sup>。当然，关于归侨的界定并非像上文表达的那么简单，特别是：若从政策法律来讲，不同时期，侨务法律政策不同，对应的归侨身份在实务中的判定也会有所差异。不过，受限于本文的篇幅，笔者暂且悬置这一问题。按照学者黄小坚的观点：“严格说来，归侨作为一个具备一定数量和社会影响力的人口群体，是中国近代以后新出现的社会现象。”<sup>11</sup>按此，中国归侨群体的生发主要导源自19世纪下半叶的华人劳工归国潮，而后因为各种原因（譬如：回国投资、回国参政、学成归国、回国避难等），大量华侨归国，使得归侨群体逐渐形成与壮大。本文探讨的杜运燮是新中国成立后方才正式归国定居的，所以涉及到的归侨群体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归国的那一批归侨知识分子。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1954年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成立，主要负责对外的统战工作以及管理华侨事务和保障华侨的合法权益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地区的侨务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949年-1960年代初（二）1960年代中-1978年（三）1978年至今。<sup>12</sup>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年，北京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侨务政策，因而吸引了大量海外华人华侨归国建设与报效祖国，彼时归侨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到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中。在彼时全球冷战的大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日益紧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忌惮共产主义的扩张而大肆渲染“红色中国威胁论”，致使中国在世界外交中几近孤立无援。与此同时，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原本被西方帝国所殖民的国家纷纷掀起反殖民浪潮，民族主义因之强化，对国民“忠诚度”的检验成为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事程。然而，被内置于归侨身份中的跨域经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侨务机构对归侨的优待政策以及普通民众将归侨刻板地归为“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使得那些具有海外经历的归国华侨不仅在政治忠诚度上招致官方的可能怀疑，还因归侨标签自带的他者化效应而难以彻底融入“纯中国人”圈

<sup>10</sup> 黄小坚，《归国华侨的历史与现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页。

<sup>11</sup> 黄小坚，《归国华侨的历史与现状》，第26页。

<sup>12</sup> 详细可以参见毛起雄、林晓东编著，《中国侨务政策概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第265-348页。间中详细陈列与析分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不同时期对侨务政策的相应调整及其表现出的阶段性特点。另外，关于归侨在不同时期侨务政策下处境则可以参阅 Glen Peterson. (2012).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55-74, 102-178.

子内。19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之争渐趋焦灼,国家的法律机器于此狂潮中基本瘫痪,侨务机构被迫撤销,原本的管理人员也被下放,上一阶段切合国情、时代的侨务政策亦被全盘否定,归侨成为需要再改造——帮助他们摒弃由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陋习”,养成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新习惯——的重点对象。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惠侨护侨政策到意识形态斗争强化时期的污名化与打压,前后的落差使得许多原先对新中国建设充满幻想的归侨知识分子离开了大陆场域,移居到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如:出生于新加坡的原甸(林佑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怀揣着革命理想投奔北京,但是最终因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而幻灭,在文革前夕选择南下香港、澳门,还有如:忠扬等。留下来的归侨作家则在这场狂潮中饱受质疑与摧残,大量归侨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场参与劳动,更有甚者被剥夺公职打为右派(杜运燮就是代表)。期间,不仅政治、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文艺创作亦几乎停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彻底宣告结束。在经历过文革的大肆折磨后,文艺界在七、八十年代掀起了一股书写与反思文革的“创伤文学热”。在此背景下,一批归侨作家也开始着手为自己在文革中被污名化平反。恰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在其《艺术的法则》中言道的,“艺术家和作家的许多实践和表现(比如他们对‘民众’和‘资产者’的模棱两可)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sup>13</sup>。归侨作家在这一时期书写南洋很大程度上与文革以来积压在心头的创伤有关,同时社会上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风潮也刺激了归侨作家的“南洋经验”,驱使他们通过重写南洋来宣泄情绪、弥合伤口,仅以20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归侨作家之小说来看,主要有:洪丝丝的《异乡奇遇》(1980年)、秦牧《愤怒的海》(1982年)、刘少卿《霹雳山风云》(1984年)、王啸平《南洋悲歌》(1986年)、白刃《南洋漂流记》(1983年)、陈残云《热带惊涛录》(1984年)、杜埃《风雨太平洋(第一、第二部)》(1985、1988年)、黑婴《漂流异国的女性》(1983年)、黄浪华《漂泊南洋》和《南洋丛林历险记》(1987年)、萧村《柔佛海峡两岸》(1988年)。<sup>14</sup>这些小说大

<sup>13</sup>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192页。

<sup>14</sup>孙爱玲,《论归侨作家小说》,(新加坡:云南园雅舍,1996),第5页。

致讲述了契约劳工的艰苦生活、华人华侨支持中国的抗战以及在抗战中做出的英勇贡献、华人华侨在南洋日治时期遭受的迫害与摧残和华人华侨参与帮助南洋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反抗当地殖民政府的统治等。如：黄浪华的《南洋丛林历险记》讲述了缅甸华侨郑延庆、李方舟、林福庚、玉香为了祖国的发展偷运橡胶籽回国的故事，小说中四人穿越层层磨难，最终林福庚牺牲在了中缅边境的密林中，换来了橡胶籽的运送回国。再如：秦牧的《愤怒的海》讲述了华人劳工被当“猪仔”买卖的悲惨经历，包括出洋前的“浮动地狱”、出洋后被园主压迫。还有如：王啸平的《南洋悲歌》、刘少卿的《霹雳山风云》、黑婴《漂流异国的女性》中都反映了南洋华人华侨在日治时期支持中国抗战，被日殖民统治者血腥镇压。归侨作家集中于文革后的 20 世纪八十年代发表有关南洋的书写，与其说是对异域经验的回忆，不如说是对“文革”权力场的反叛与反思，或许也是在倾诉一种潜藏心中已久的“被欺骗感”——恰如《漂泊南洋》中黄坤元言道的，

眼下，“唐山”正是天翻地覆！许多事情，都翻了个！过去欺压人的人，现在抬不起头来了，过去当牛作马的，现在当家做主了！……现在国家好了，各种人才都需要。<sup>15</sup>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海外华人华侨受到国家的感召（当然与新中国初期的惠侨政策有莫大的关系）回国，而后“文革”期间的强力打压，其中的这种巨大落差塑造了此一感受。不过，有趣的是，黄浪华《漂泊南洋》最后却出现了一对值得玩味的对照，与主人公黄秋楼同行的黄坤元在从南洋重返唐山的旅途中，一方面写道“别了，南洋！从此我再不会回到你的怀抱中了”<sup>16</sup>；另一方面，又在哼唱的小曲中言道“再会吧，南洋！……你是我们第二故乡”<sup>17</sup>。一个是“再见”（或者说诀别），一个是“再会”（希望重逢），这种既要诀别又渴望重逢的心态使得归侨作家笔下的“南洋”似乎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载体，而更应该被当作是一个“文学空

<sup>15</sup> 黄浪华，《漂泊南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 155-158 页。

<sup>16</sup> 黄浪华，《漂泊南洋》，第 213 页。

<sup>17</sup> 黄浪华，《漂泊南洋》，第 213 页。

间”，作家的“中国性”<sup>18</sup>与“南洋性”<sup>19</sup>在其中自由的交汇、碰撞。按此，“南洋”在归侨作家处变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形构的“空间”，它既可以被纳入到权力场的辖制中，又可以超脱于权力场之外成为精神隐逸的花园。由是，下文中，笔者将把视点落实到杜运燮的诗作中（特别是收录于《你是我爱的第一个》中的诗文），探索其南洋书写与“南洋”作为隐逸空间被调用的可能。

### 三、作为隐逸空间的文学南洋

“隐逸”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言道：“说隐士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色，亦没有错”<sup>20</sup>；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Bill Porter)在《空谷幽兰》中也写道：“在美国，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个儿呆着的人，往往都有点神经质。但是，在中国，我发现隐士往往是社会的精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sup>21</sup>。中国的“隐”文化是独特的，且长期植根于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中的。“入仕”与“退隐”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心中难以消解的矛盾。从“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到西汉东方朔“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sup>22</sup>再到中唐王维的“亦官亦隐”；而后白居易题诗《中隐》，“中隐”一词方为世人所广知，并成为介乎于“大隐”“小隐”之间中国“隐”文化的折中形态为后世普遍谈论。

<sup>18</sup> 本文所论中国性主要是美学与文化上意义的，诸如中国神话、意象、意境、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库(repertoire)以及中国的哲思，如儒、道、佛思想等。当然有时也牵涉到一些政治的含义，例如：民族主义，但是却不包含“国家”的概念。详参许文荣：《马华文学中的三位一体：中国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的同构关系》，收录于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主编的《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台北：新锐文创，2012，第20-21页。

<sup>19</sup> 诚如“中国性”主要取道美学与文化上的意义。“南洋性”作为与“中国性”的对照，其也主要是美学与文化上的意义。恰如“中国性”所指涉的，“南洋性”作为对照当然同样会牵涉到政治的意义，但是却并非后期民族国家观念宰治下的“国家”概念。

<sup>20</sup> 梁漱溟先生之所会如此说，其实是在回应蒋星煜先生在其《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谈到的，“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隐士’这个名词和它所代表的一类人物，是中国社会的特产”。另外，陈传席、刘庆华着的《精神的折射——中国山水画与隐逸文化》第一章的标题，“隐逸文化：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也直接点明了中国“隐逸文化”的独特性。详参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59页；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3页；陈传席、刘庆华：《精神的折射——中国山水画与隐逸文化》，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8，第1页。

<sup>21</sup> 比尔·波特(Bill Porter)著，明洁译，《空谷幽兰——寻访当代中国隐士》，（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第1页。

<sup>22</sup>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250页。

“隐初在我，不在于物”<sup>23</sup>，从小隐到大隐再到中隐，其实也可以看作是“隐逸”思想的一个流动发展的过程。“小隐”可以说是“隐”的最初形态，是在经历过“仕途”的虚伪与艰辛后做出的应激反应，它通常导向一种以地理上偏离庙堂来带动心理之“隐”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的理想程度是“洁身自好”“避世而居”“超然外物”，而正因此，所以“小隐”之士在现实中通常到最后是穷困潦倒、不得不为生计谋划，这也就使得“小隐”之“隐”最终成为了空谈<sup>24</sup>。“大隐”则是对“小隐”的再反应，抓住了“小隐”困生活窘的一面，不再强求于避世山林间，而是在凶险、复杂的官场中寻觅一方思想的净土，尝试将“仕”与“隐”调和在一起。然而，“大隐”虽解决了“小隐”为生活发愁的苦恼，却形成了新的苦恼——现实中，“大隐”之士往往会因为官场的压力而被迫妥协服从、卑躬屈膝来坚守自己所谓的价值理想。不过，这种奴颜婢膝换来的心灵绿洲真的存在吗？或许绝大多数的“大隐”之士最终只能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沦为政治的附庸。职此之由，当“大、小隐”思想形成后，一方面为了能有充足无忧的生活条件，一方面又为了能活得自由、遗世独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士人在“仕”与“隐”之间来回游荡，以期寻找一种平衡。譬如，王维身居朝堂、家室显赫，他将自己的人格分成了两个部分，即：朝堂上他将自己视作一个社会人、臣子；朝堂外他马上遁入他的辋川别业中，进入一种“小隐”的理想状态。但，纵然我们有看到古代士人力图弥补“大隐”“小隐”之不足的决心与调和“仕”“隐”间冲突的信念，然，他们始终没有真正意识到如何将“仕”与“隐”之间的边界消弭，就注定了他们的“隐逸”思想/生活情态不能更上一层。直到白居易提出了“中隐”，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隐是“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sup>25</sup>，即点明以往于割裂中寻找平衡的无用。综合来看，“中隐”的特质可归纳为：（一）

<sup>23</sup> 房玄龄 撰，《邓粲传》，《晋书》卷八十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第15页。

<sup>24</sup>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隐逸”特征的概括，“第一，在政治上便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虽再三礼请，亦不出来……这种人不但出现而且历代都很多，在历史传记中占一位置，在社会舆情上有其评价。第二，在经济上，便是淡泊自甘，不务财利，恰与宗教禁欲生活与近代西洋人欲本位之一中间型……第三，在生活态度上，便是爱好自然而亲近自然，……对自然界只晓得欣赏忘机而怠于考验控制，如西哲所说，善于融合于自然之中，而不与自然划分对抗。”按此，经济上的淡泊是“隐逸”很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那些小隐之士因为“避世而居”、“远离朝堂”，加上中国的隐士大体是有知识分子构成的，古代士人对农工商又保持着“不齿”的传统，所以这些小隐之士最终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不得不为生计煞费苦心，原本经济上的淡泊也似乎难以达成，因此“小隐”之“隐”只能沦为纸上谈兵。详参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59页。

<sup>25</sup> 白居易，《中隐》，收录于（清）彭定求 纂，《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五，（清康熙四十四至四十六年扬州诗局刻后印本），第17页。

经济上能够自足,无需为生计而苦恼; (二)政治上,从本质而言仍然是排斥“入仕”,但也并非全然反对,而是适度的,即表现出一种远离“权力中心”却又并不跳出“政治圈”的姿态。如:在官场中担任闲散官职,不入仕途而又不刻意回避或者攀附“政治圈”的态度。(三)这一点也是最为特殊的,就是“中隐”的“混融性”(非割裂的)。

任何概念、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社会的转变而扩充、迁移。用现代语言学的思维来理解,也就是:任何的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并非刻板地对应,而是在与他者的对照中确立关系的;结合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所提出的“延异”(différance)概念,我们的语言活动往往是消极的,通常不能真正表达出我们真实想要表达的内容,以致词语的全真含义在语言活动的时间链上被不断地延缓实现,这也就如同石子被掷入水中泛起的涟漪,不断地向外推延、分异。“中隐”便是如斯所言,它的具体意涵会因为时间、文化等历时与共时层面的因素被无限延异。按此,现时状态下儒学传统的改变是否已使得在现代社会讨论“中隐”丧失了意义?显然邓晓芒给出了否定的观点,他认为,传统以儒学为主的教育背景虽已变革,但是从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的兴起、历代科举取士,儒学可以说已经内化于每个中国人甚至海外华人的思想中,成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sup>26</sup>职是之故,纵使儒学教育传统发生了迁移,但是那种根植于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思维中的“儒学无意识”仍在不断向人们输送着“隐”的观念,也即:中国语境中,“中隐”文化尚存,只是在抽象继承“中隐”特质之外,形态有所变化。

如上,杜运燮的南洋书写大致可以按照“文革”分为前后两期:文革前,其南洋书写恰如朱崇科、张灵馨所言的,“1940年代前半段的诗歌创作,虽然他身在中国,却心系南洋;其对马来西亚半岛的情感和了解,远比南来作家更为深厚”<sup>27</sup>。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杜运燮由于高中与大学回返中国就读,使得他在书写南洋时常常呈现出“南洋性”与“中国性”的牵扯,例如:在对他《马来亚》

<sup>26</sup> 邓晓芒,《我与儒家》,《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04期,第32-33页。

<sup>27</sup> 朱崇科、张灵馨,《论杜运燮的“南洋”情结及其再现》,第21-22页。

与《滇缅公路》的比照中，我们可以发现，

当年，没有马来人到不列颠去留学；没有马来人进殖民地政府办公厅；没有马来人摘椰子给英国人榨油；没有马来人为白种人做苦工，被踢、骂；那时大家都快乐，不必耕，不必流汗，果树满地生；深林里到处有肥美鸟兽等你捕擒。<sup>28</sup>

《马来亚》写作于日占时期，诗中作者有意的反殖民与去殖民思想的输入表达了对当地人的同情与怜悯，体现了浓浓的“南洋性”；而，《滇缅公路》中则写道：

“给战斗疲惫的中国送鲜花的海风，送热烈的鼓励，送血，送一切……”<sup>29</sup>，跨越中国与南洋的公路从南洋向中国输送，这一输送的方向已经暗示了诗作的“中国性”。如此，“中国性”与“南洋性”的反复拉扯构筑了杜运燮文革前对“南洋”的文学制造。

文革中，文艺活动备受打压，“海外经历”往往被污名化成为“特务”“间谍”的判定条件，所以归侨作家都会有意/无意地隐藏自己的“归侨”身份。例如上文谈到的黄浪华的《漂泊南洋》，最后黄坤元既要告别南洋又渴望再会南洋的矛盾心理，或许也正是文革的应激反应：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归侨归国为了帮助社会主义建设，希望融入广大民众当中，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所以黄坤元会说到“别了，南洋！”，强调自身坚定的中国认同，以宣告文革期间打击归侨的无理性。另一方面，文革中对归侨的迫害使得原本积极投身革命的热情消磨殆尽，“南洋”成为怀旧的主体，被当作文革创伤的疗养地，寄托了原本对新中国的幻想；譬如，《漂泊南洋》中主人公黄秋楼与陈正华、余小霞（南洋华侨）以及跨种族好友阿吉利亚（马来人）之间互帮互助的深厚情谊似乎也在反衬文革时期同胞之间的互相猜忌。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按照以往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归侨作家的南洋书写反映了华人华侨的吃苦耐劳、爱国爱乡以及世界主义精神与跨种族情谊”<sup>30</sup>；然而，无论是被用于反映那种情感，“南洋”似乎都被

<sup>28</sup>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怡保：霹雳文艺研究会，1993，第30-35页。

<sup>29</sup> 杜运燮，《海城路上的求索》，（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第4页。

<sup>30</sup> 孙爱玲，《论归侨作家小说》，页137-160；李君哲，《海外华文文学札记》，（香港：南岛出版社，

当作是一个载体来看待,并非真正注意到归侨作家文学中所蕴含的对“南洋”的情感。在笔者看来,归侨作家书写南洋不仅承载了“中国性”,而且包蕴了对南洋的情感,同时这种情感与怀旧心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杜运燮诗歌中的“故乡”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从文革前中国与南洋(双乡)间的极限拉扯,到1980年代写成《故乡毕竟是故乡》去刻意隐藏自己的“海外经历”,认同父亲的故乡(福建古田)就是故乡——“故乡就是故乡。那是我脚踩的第一块土壤;生命的嫩芽在那里出土,第一次沐浴祖国的阳光;幼年在那里向深处扎根,第一次尝到山泉的清甜”<sup>31</sup>。结合1980年代作为文革后的初期阶段,杜诗所传达的“单乡”观念不仅是一种政治宣言,更是一种对自身身份断裂的追寻(因为文革期间对“海外经验”的排斥让大量归侨在身份认同上再次断裂、离散,成为祖国的异乡人,所以杜运燮《故乡毕竟是故乡》强调“单乡”或许也就是在补足这种断裂,表现一种“既然‘海外经验’使我身处故乡却仍然流离、没有归属感,那我就隐去它”的心理)。从“双乡”到“单乡”,其中受到权力场的约束是显而易见的。然,这种“单乡”的观念并没有维持太久。1992年,杜运燮在重返马来西亚实兆远探亲时当即写下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献给我的第二故乡》<sup>32</sup>,正如许文荣在其论著中谈到的:

虽然实兆远是他的第二故乡,但是他却是他爱的第一个。以及‘第一人称叙述’的运用拉近了叙述对象与作者之间的情感距离。同时,在这首52行的诗里,和‘一’这数字有关的词,即‘第一个’共出现6次,‘第一次’共出现5次,这两个词有效地揭示了诗人与他‘第二故乡’的特殊感情,虽名为‘第二故乡’,实际上却占有着许多的‘第一’,这也是诗中在数字上所构成的一种张力。<sup>33</sup>

杜运燮以大量的“第一”叠加于“第二故乡”(实兆远)之上,表现了杜运燮在上一阶段被“单乡”思维压抑后的情感宣泄。当他再次踏入马来西亚这个熟悉又

2000),第198-202页。

<sup>31</sup> 杜运燮,《海城路上的求索》,第88页。

<sup>32</sup>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第6-8页。

<sup>33</sup> 许文荣,《杜运燮诗歌中“情感”与“形式”的动态关系》,第36页。

陌生——熟悉是因为生于斯并曾成长于斯，陌生是因为离别多年后许多事物早已物是人非——的场域时，他发现原本被迫抹去的“第二故乡”根本无法忘怀，往事历历在目；但，同时，杜也意识到“往事的不可追”，对“第二故乡”的“朴素回归型怀旧”<sup>34</sup>终归会陷入到卢卡契所言的“超验的无家可归”<sup>35</sup>之境地。此外，上一阶段所追寻的“单乡”观念的失败，也预示了“认可现实对过去的必然取代，想把过去融入到现实以至将来的精神生活中，寻求自我的连续性发展的‘永恒认同型怀旧’”<sup>36</sup>的不可能。因是，杜运燮对于“南洋”的怀旧只能选择“游移反思型怀旧”，通过“承认过去的一去不复返，保持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独立性”<sup>37</sup>来抒发对“南洋”/“第二故乡”的情感，例如：《云顶的云》<sup>38</sup>抒发了对云顶赌场的辛辣讽刺。彼时，诗人的重建“双乡”的观念，但是此“双乡观念”已与文革前的“双乡观念”有所区别了：文革前的“双乡”观念在对“南洋”进行抒情时往往会受到政治“中国性”的钳制，无论是《马来亚》《滇缅公路》还是《热带三友》（早期散文版），“南洋”总是容易被当作“容器”来承载“中国性”；而，文革后的重返“南洋”场域，《热带三友》<sup>39</sup>不再是“岁寒三友”的热带翻版，而是直接抒发对“椰”“蕉”“木棉”的喜爱之情。此外，杜运燮在“单乡”观念时期追寻身份连续性的失败使得他重返“南洋”场域时也不去渴求在此寻找身份弥合的可能性，毅然地选择了“游移反思型怀旧”，注重现时，把握分散在现时中的历史碎片，因此他可以在“南洋”场中恣意言语。综上，“南洋”在杜运燮第二次的“双乡观”建构中已经超越了第一次建构时的“容器”地位，成为一个可以随心抒发情怀的“隐逸”的文学空间。他可以直抒对南洋的情感，而不被“中国性”权力话语和南洋本土权力话语局限，又可以让“中国性”与“南洋性”在诗文中平等对话，更可以让南洋作为承载中国性的容器。总之，“南洋”对于杜运燮而言，不再是简单的文学容器，而是作为文学空间，能够将“隐逸”情怀归置其中。

<sup>34</sup> 朴素回归型怀旧是对现实绝对不满，想重返过去，希望重新体验到过去的生活感受。详参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352页。

<sup>35</sup> 转引自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著，杨德友译，《怀旧的未来》，（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第27页。

<sup>36</sup> 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第352页。

<sup>37</sup> 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第352页。

<sup>38</sup>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第22-23页。

<sup>39</sup>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第24-29页。

## 四、余论

随着文革格局在中国的破碎,改革开放为社会注入了新的力量,文革时经历了身心多重创伤的写作人们不约而同地写回了那段复杂、坎坷的历史,他们一方面是为了反思那个疯狂的年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透过文字诉说积压多年的苦痛和净化疗愈心灵的伤口,由此“伤痕文学热”在中国文坛成形。不同于其他作家,归侨作家们大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感召而毅然北归的,有的甚至辞别亲友独身一人回返祖国,然而冷战背景带来的对政治纯洁性的过度追求令一大批归侨知识人被无辜怀疑而遭打压。由此,相比而言,当文革后文艺逐渐复苏之时,在父地(祖国)经受创伤的归侨作家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他们纷纷从文本上写向南洋,借海外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热爱来为文革中的污名平反,同时也有意以怀想母地(南洋)来寻求慰藉。杜运燮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虽在文革中遭受打压,却未因此而在平凡后逐权力中心,也没有就此而意志消沉。1992年,当他再次重返南洋,并在不久后创作出版了诗文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间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洋”作为中国场域外的异域空间,不仅从地理空间上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存在,而且也在杜运燮文本中成为游离于中国话语之外的话语装置。彼时的“南洋”在杜氏文学中不再是作为承载中国意识的容器而存在,而是一个隐逸的空间,在其中他可以跳脱一些掣肘来客观地审视中国社会,又可以中国人的身份投射出回望南洋的他者视角。换句话说,杜运燮的文学“南洋”成为相离于权势之外的秘密花园,他可以在其中恣意栽种任何其所想之花卉。

## 参考文献

- 比尔·波特(Bill Porter)著。明洁译。《空谷幽兰——寻访当代中国隐士》。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陈传席、刘庆华。《精神的折射——中国山水画与隐逸文化》。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8。
- 邓晓芒。《我与儒家》。《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04期:页29-33。

-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怡保：霹雳文艺研究会，1993。
- 杜运燮。《海城路上的求索》。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 房玄龄 撰。《邓粲传》。《晋书》卷八十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
- 黄浪华。《漂泊南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黄小坚。《归国华侨的历史与现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刘康《后殖民理论与“华语语系文学”——评吴娱玉〈西方理论中的中国〉》。《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10期：页91-96。
- 李君哲。《海外华文文学札记》。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
- 李詮林。《艺术身份的聚结与文化身份的流散——“九叶诗人”杜运燮的华文书写谈隅》。《华文文学》2012年第06期：页56-60。
- 李詮林。《“侨易文学”、马来西亚留中文学与西南联大的欧美风——杜运燮归侨诗歌异国因素和身份感知辨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2年第03期：页14-21。
- 李树枝。《“来回”马来半岛与中国大陆——论杜运燮诗作之马来半岛空间书写与蕴含》。《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02期：页70-74。
-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毛起雄、林晓东编著。《中国侨务政策概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主编。《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台北：新锐文创，2012。
-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 孙爱玲。《论归侨作家小说》。新加坡：云南园雅舍，1996。
-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著。杨德友译。《怀旧的未来》。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 许文荣。《搭建中国与南洋的鹊桥——论杜运燮诗文创作中的双重经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06期：页73-79。
- 许文荣。《杜运燮诗歌中“情感”与“形式”的动态关系——以南洋诗集〈你是我

爱的第一个〉为个案分析》。《华文文学》2011 年第 06 期（总第 107 期）：页 35-41。

朱崇科、张灵馨。《论杜运燮的“南洋”情结及其再现》。《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01 期（总第 173 期）：页 19-28+170。

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彭定求 纂。《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五。清康熙四十四至四十六年扬州诗局刻后印本。

Glen Peterson. (2012).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